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

民族学人类学精选译丛·第一辑

张海洋 / 主编

非洲民族：该民族的国家

The African Natio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加纳] 奎西·克瓦·普拉 / 著

姜德顺 / 译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

民族学人类学精选译丛·第一辑

张海洋 / 主编

非洲民族：该民族的国家

The African Natio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加纳]奎西·克瓦·普拉 / 著
姜德顺 /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洲民族：该民族的国家 / (加纳) 奎西·克瓦·普拉著；
姜德顺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12

(人类学民族学精选译丛 / 张海洋主编)

书名原文：The African Natio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ISBN 978 - 7 - 105 - 13047 - 4

I . ①非… II . ①普… ②姜… III . ①民族历史—非洲
IV . ①K4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6993 号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01 - 2013 - 5267

非洲民族：该民族的国家

著 者：(加纳) 奎西·克瓦·普拉

译 者：姜德顺

主 编：张海洋

责任编辑：张宏宏 向 征

责任校对：郭金乔

封面设计：金 晔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64228001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360 千字

印 张：26

定 价：6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047 - 4 / K·2279 (汉 126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者的话

非洲距离我国很遥远。我国各界对非洲的真正了解，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全球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我国学术界对非洲的研究则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各界对非洲的了解更加深入，与非洲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人员来往日益频密。目前，在非洲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以及华侨、华人已超过一百万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对非洲的认识和了解，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比之对亚洲、欧洲、北美等地区，还较为薄弱。从我国已经出版的有关非洲及其各国的各种书籍，包括译著来看，在其作者当中，仅有不到百分之五是非洲本土人士。因此，《非洲民族：该民族的国家》就尤显珍贵。

《非洲民族：该民族的国家》一书的作者奎西·克瓦·普拉教授不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非洲人，而且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的关系很密切。泛非主义运动肇始于19世纪后期，由该运动发展而来的，于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由该组织演变而成的2002年组建的非洲联盟，都是集政治、经济和军事于一体的全非洲性的政治实体。

普拉教授于1942年出生在加纳的库马西，系阿肯族人，其父母均在伦敦受过高等教育。其父亲曾任殖民政府总会计师，外祖父是一位酋长。普拉教授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一所著名中学毕业后，

非洲民族：该民族的国家

于1963年赴荷兰莱顿大学学习，获文科学士及硕士学位。随后，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他还在阿姆斯特丹学习期间，就曾经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某下属机构的活动。20世纪60年代末期，普拉先生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任教期间，被选为“加纳国家学生组织”的总书记。此后，他返回阿克拉，为津巴布韦无家可归的儿童和“西南非人民组织民族解放运动”提供资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普拉教授先后在赞比亚、苏丹和博茨瓦纳的一些大学任教，同时还以各种形式支持南非非洲人的抵抗运动。近年来，普拉教授在南非西开普大学退休后，牵头成立了设立在南非开普敦的非洲社会高级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至今。

在《非洲民族：该民族的国家》一书中，普拉教授以其对非洲社会十分透彻的了解和切身感受，以“纵览千年、目及八荒”的独特视角，秉持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贯立场，把包括非洲本土和海外的所有非洲人视为一个整体，表达并阐释了对于“非洲民族”（African Nation）的见解。同时，他并不把阿拉伯世界包括在非洲民族之内，认为阿拉伯人属于阿拉伯民族，而非洲人才属于非洲民族。他追昔抚今，扼要而系统地回顾了非洲大陆的殖民化过程、贩奴活动以及泛非主义的简史，不仅着眼于往昔和他人，更立足于当前现实和非洲人自身，抨击和剖析了非洲各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呼吁非洲人加强团结，为实现泛非主义的美好理想、实现非洲统一而奋斗。

此外，《非洲民族：该民族的国家》一书还对现代化和发展问题，做了理论归纳，对民族主义、民族问题、族性和语言等方面，都有专门的论述，有助于我国读者从中切实了解相关细节。

当然，《非洲民族：该民族的国家》一书不可能尽善尽美、囊括一切。从译本角度来看，由于受到非洲母语的影响，极个别表述

似略显不甚晓畅，但这并不足以影响全书的优良品质。

另外，我们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依据我国相关的出版法律法规，对第一章“我们是如何迷途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删节，主要涉及对外国领导人，如普京总统、尼日尔总统马马杜·坦贾的负面评价部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评价部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部分。

我社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包括非洲民族在内的世界民族问题的研究，出版了一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著作。该书是原作者一直坚持从事非洲民族问题研究的成果，颇具有学术价值，故我社将其郑重推出。我社还将继续关注此类著作的出版，争取为学术界贡献一臂之力。

编者谨识

2013年6月20日

本书献给非洲以及海外非洲人之青年们，
希望他们会应付自如，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为了实现全世界所有非洲人们的统一、解放、
民主以及发展而战斗，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致 谢

本书断断续续历经几年才完成。一直在力劝我撰写这样一部著作的泛非主义者们、朋友们以及同事们，对它予以积极鼓励。他们人数太多，在此未便一一提及。

然而，就付出辛劳而言，我乐愿提到用去数不清的时间而为本书做准备工作的我的秘书格雷斯·奈杜（Grace Naidoo）。

奎西·克瓦·普拉
于开普敦

前 言

本前言追溯一些想法的梗概，在下文中我会更详细地说出这些想法。所以，先在这里对下文略略品味。读者有望对后面所述内容不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非洲种种问题使我困扰，缠绕于我心间。无论感性地还是理性地说，这些问题在我心中产生了广泛的反应。但是，本书所言及的非洲，远远超出这些考虑因素。正是一群人民和一段历史，一个与文化紧密相连的网络，必须公平和人道地基于其本身的历史和文化，而非抱着他人对未来所持偏见，找到统一的未来。正是这种统一，将会让非洲人得到解放和发展。我们延缓这种统一越久，且我们延迟我们的解放和发展越厉害，那么，我们就会更长久地扩大正在遭逢的痛苦。另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为非洲的未来所做的设计和构建，必须牢牢掌握在非洲人手中。只有非洲人才能够拯救非洲。利用基于民主的各项原则以及对人权的关注，非洲人民能够且必须统一地朝向现代而前进。本书涉及的一些问题包括解放、民族主义、泛非主义、民主、统一、战争、语言和文化。这是一些关键词。

非洲是一片广袤的大陆，对于其地域的大小，如同关于它的许多事情一般，被人们误传得很厉害。事实上，非洲是全世界最宽广的一片大陆，面积为 1125 万平方英里。实际上，非洲很大，有美国的北美本部、西欧、中国和印度加在一起那样大。的确，就这些资源而言，一些掠夺成性的社会和机制已经在历史上掠夺了非洲和非洲人。非洲人绝大多数是黑人，但并非所有非洲人都是黑人。当我们处在新世纪的开端，回顾身后并展望长久的未来，我们能毫不畏惧地说，我们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在 20 个世纪已经横穿了许多地方。我们已经

从一个工业化之前时代，带着对未来现代性的一些誓愿，走向正在工业化的技术—社会环境中，即使我们做出正确的奉献并采取必不可少的措施，也是如此。我们也已行经长达几个世纪遭受剥削和奴役的历史性地带，其间充满了苦难和悲痛。这段历史很不幸地尚未完结。大量这些条件的社会学遗产和明显的社会—心理遗留，以许多不同的形式依然与我们伴生。我们艰难往昔留下的这些社会性—结构性遗迹，久久挥之不去，神出鬼没地阻滞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些新殖民化的国家及文化中，却假装自己生活在由满负荷的“民族”构成的各种各样的国家中。毋须多言，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往昔必然告诉当前，而当前必然会对于将来施加强大影响。但这种经验究竟有多少可以积极而审慎地予以利用，使之有助于形成我们为了未来而制定的当前计划？我们究竟是人类当中的什么人？关于这些问题，正如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①论及历史错误时所言：“不吸取历史教训之人，注定要重复历史。”

一个世纪前，我们只是处于从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迁徙而来的几十年。阿拉伯人进行的奴隶贸易正在消散，但是奴隶贸易依然兴盛。西方列强正忙于在非洲进行各殖民帝国的竞争，并经由他们所称的“惩罚性的远征”和“绥靖活动”，残忍地以铁与血在非洲社会打下他们所行规则的印记。对于采用雇佣军进行殖民化种族灭绝战争和焦土政策，这些说法只不过是一些委婉辞藻，以便把非洲的反抗纳入殖民规则中。在这个过程中，成百万上千万的非洲人死了。这样就完成了对非洲社会及历史的劫持，自非洲人与西方人相遇的早期，这种劫持就已进行。

在此后的一个世纪，殖民体系变来变去，这种体系的古典形式如同其最初悄悄加之于我们那样，已经偷偷摸摸地消失。但是，并非没

^① 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20世纪著名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和学者。详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4月，第31页。——译者

有经过战斗，非洲人在经历了数十年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之后，方才获益，这种斗争使非洲人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从肯尼亚的土地与自由之战（the Land and Freedom War）即茅茅运动（Mau Mau）^①，再经过发生在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战争，非洲人为了追求自由而牺牲了大量的生命。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起的以往 50 年里，殖民强权经历了缓慢但切切实实的解散。殖民秩序的结束并不受极端殖民主义者的欢迎。但这种结束是看得见的，亚洲人开路在前，非洲人急忙跟上。对于我们而言，压倒一切的反殖民式民族主义经历，就是泛非主义。

现代通信对于传播泛非主义思想起着重要作用。起先是报纸，接着是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对于非洲人之间的交流贡献巨大。若干年前，曾任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的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 Lyttelton）怀旧地写到，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英帝国主义有力量口授谈判条款：“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再加上炮舰，或者小小地展示一下武力，很快就能平息混乱和争议。最重要的是，白人就应该知道答案。那时还不能设想会有什么泛非运动，更不用说产生这种运动了，因为非洲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的交流都很原始，慢腾腾的，简直难以传送某块领土上民族主义渴望的火苗，且难以在另一块领土上点燃同样的火。”^②

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世界鼓励不受限制的帝国主义，这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20 世纪初期，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这位对基督教屡屡表现出激情的安立甘公教派显贵，反对埃及自治，宣称他不希望“长久地压制黑人种族”，但“如果要想保持我们在这些

① 茅茅运动，20 世纪 50 年代肯尼亚吉库尤人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主张以暴力推翻英国在肯尼亚的殖民统治。详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 5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1 月，第 742 页。——译者

② Oliver Lyttelton, *The Memoirs of Lord Chandos*, The Bodley Head, London, 1962, p.352. 利特尔顿的观点显而易见，他认为“无线电广播已经渗透到各个村庄里。三四十年前非洲人还毫不知晓的那世界的不和谐声音，从挂在菩提树上蜂窝一般的接收器中发了出来”。（原书为统一附在全部各章最后的连续尾注，为了便于阅读，现改为页下注。下同。——译者）

国家的地位，那就只能这样干，因为目前只能保持这种地位并实现一个优等种族的功能。”^①当然，最终他没有实现自己的计划。反对殖民地摆脱宗主国统治的经典说法，出自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在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即将崩溃前夕，丘吉尔非常认真地说了一番话：“我没有成为国王陛下（乔治六世）的首相而为帝国的瓦解负责。”丘吉尔暂时顽固地维持了现状。但是，正像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对历史的现实主义评价并未同步发生。在丘吉尔担任首相的第二任期（1951—1955年）里，确实没有任何英国殖民地摆脱殖民统治，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艾德礼的工党内阁执政期间（1947年）赢得自由。对于大英帝国而言，印度独立敲响了“约翰牛”殖民主义的丧钟。随着人类解放过程的滚滚向前，这个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瓦解。^②马格里奇（Muggeridge）事后对于丘吉尔所下决心的想法，认为“当他在乔治六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手下于二战后担任首相，而此时大英帝国正在飞速瓦解，只好把那些勇敢的话语吃掉”^③。在艾德礼于1954年所出的自传中，若有所思地简洁说道：“我很清楚，我们在印度曾经遇到的那种民族主义情感浪潮和提高黑种人地位的愿望，现在已传播到非洲。”这些话比丘吉尔的话更好理解。艾德礼还说：“我也很明白，如果不能合理地满足这种愿望，就会使事情更加糟糕。”^④后

① Francis Williams, *A Pattern of Rules*, Longmans, London, 1965, p.226.

② Brain Crozier, *The Rebels: A Study of Post - War Insurrections*, Chatto and Windus, London, 1960, p.109. 克罗齐尔（Crozier）认为，“温斯顿·丘吉尔交代说，他没有觉得他该为大英帝国的瓦解而负责。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年月里，从这方面争论的立场来看，当时是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执政。1947年的工党政府让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在英联邦内独立，并让缅甸在英联邦外独立，却并未避免流血；但并不是英国士兵们流血，而且好几次殖民地战争避免了憎恶、麻烦和金钱开销”。更为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帝国主义者都很懂得，已经到了撤退的时刻。利特尔顿写道：“我觉得，在1951年担任殖民地国务大臣的任何人，都可能会做出我们当时所做那样的决定。殖民政策的主导话题都必须是小心的，而且，各个殖民地都可能渐渐且有序地在英联邦内走向自治。”见 Oliver Lyttelton, *The Memoirs of Lord Chandos*, p.352.

③ Malcolm Muggeridge, *Tread Softly For You Tread on My Jokes*, Collins/Fontana Books, London, 1966, 1969 edition, p.212.

④ C.R. Attlee, *As it Happened*, Heinemann, London, 1954, p.191.

一任英国首相对于局势做了相似的判断。1960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位于开普敦的南非国会发表了一场演讲，他靠着墙壁向那懊恼而多疑的白人种族主义国会大声朗读了讲稿：“变化之风正在吹遍这个大洲。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场民族意识之风是政治事实。”这场演讲后来以“变化之风”而载于关于非殖民化的编年史中。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为了达到效果，继续并放大了哈罗德·麦克米伦的隐喻而写道：“变化之风如同飓风一般在整个亚洲和非洲怒号。”^①南非国民党（Boer Nationalist Party）的政客们冷漠地听了麦克米伦的那场演讲，他们既不相信，并抱以蔑视地沉默相待。当演讲结束时，这些政客当中的一些人甚至相当失礼地不鼓掌。种族隔离制度的设计者、第一代由荷兰移居南非的移民、南非国会议长维沃尔德（Verwoerd）向麦克米伦致以礼节性的谢意，但是却暴躁而坚定地提出他的异议：“……我们是为非洲带来文明的人……在非洲行使正义，就意味着不仅要对非洲的黑人公平，也要对非洲的白人公平。”^②麦克米伦那场50分钟的演讲很重要，在全世界引起反响，并标志着使非洲各殖民地获得自由已稳稳地列入英国的议事日程，这并非像许多人宁愿相信的那样是一项无私的、来自偶然灵感的计划，而是考虑过私利及有根据的自我利益之后而设计的愿景。把殖民地的权力转移，并放弃给战略上值得信赖的精英，比由于疏忽而出现急急忙忙的反殖民起义而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更好。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殖民地当局而言，这是难以接受的启示和明智行为。为发生在印度尼西亚、马来亚、中印半岛的起义，以及中国的红军于1949年取得胜利，提供了好样而充足的经验。麦克米伦发表的那次演讲，预示

① 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ition, London, 1969, pp. 138 ~ 139.

② 麦克米伦在其自传中，就此次在南非国会做演讲时对维沃尔德所感到的失望和静静的憎恨而写道：“我们只是那天晚上在一起晚餐。尽管维沃尔德先生显然为国会出现的那情景而苦恼，但他几乎没提到那次演讲。”见 Harold Macmillan, *Pointing the Way, 1959—1961*, Macmillan, London, 1972, p.160.

非洲民族：该民族的国家

了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在世界上受到孤立。仅在麦克米伦发表演讲而不加掩饰地予以警告约一个月之后，沙佩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惨剧（于1960年3月21日）发生了，全世界都感到震惊、悲痛和厌恶。慢慢跟着而来的是贸易、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抵制和制裁。然而，又经过另一个30年的斗争，在种族隔离定居殖民制度的结构崩溃之前，索韦托（Soweto）学生于1976年举行起义，这一种族隔离制度最终于1994年被正式埋葬。在种族隔离制消亡10年之后，人们容易忘记，多年来，种族隔离制在全世界某些高等而傲慢的地方确实还有朋友。在种族隔离制实行的最后10年里，美国的里根政府面对全世界对于种族隔离制的厌恶，还推行着一套所谓“建设性地介入”南非的政策。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醒我们，为了找到出路，以逃避国会对于援助南非以及与其进行某些类型的贸易而制定的禁令，里根政府的追随者们坚持认为，南非政权正在捍卫自己，抵御着世界上“更为臭名昭著的各个恐怖组织”其中的一个组织。这种说法指的是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非洲人国民大会。^① 英国撒切尔政府采取了与里根政府相同的立场，唯恐我们会忘记似的。

夏尔·戴高乐持有悲哀的看法，1947年，他认为法兰西帝国的损

① Noam Chomsky, *Imperial Ambition, Conversations with Noam Chomsky on the Post-9/11 World,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Hamish Hamilton/Penguin, London, 2005, p.95. 乔姆斯基引用了载于1989年1月14日《纽约时报》上罗伯特·皮尔（Robert Pear）的话。其中说，1966年，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对于法国与种族隔离制之间的同谋，曾经写道：“整个贸易量适中，但1961—1965年之间的贸易量增大一倍。至于说到投资，雷诺（Renault）、标致（Peugeot）、贝利埃（Berliet）、汤姆森-休斯敦（Thomson-Houston）这几家公司在南非设有分公司；法国是南非的第三大投资国，仅次于英国和美国，科技合作也在进行。法国在比勒陀利亚附近建立了卫星跟踪站。南非专家正要前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进行太空研究。一些法国技术人员已被派往南非进行石油钻探合作，那里的钻探刚刚开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1963年3月，汤姆森-休斯敦公司的那位代表在访问南非期间说：‘政局良好，在政府控制下事情都处理得很好。没有改变的理由。’事实上，法国政府是第一个鼓励与南非建立关系的。”引述中还说，那些与种族隔离制对抗的人应当知道，他们并不孤独。见法国反对种族隔离联络委员会于1966年11月9日在巴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声明。见 *United Nations Centre Against Apartheid, Notes and Documents*, No.10/81, April 1981.

失“甚至会使法国蒙受以独立为代价的耻辱”^①。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悲伤地承认：“当时令我难以忍受的苦恼，就是移交了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国旗，并结束了历史上伟大的一章。”^② 值得记住的是，戴高乐所了解的非洲人都很少讨人喜欢。在苏兹贝格（Sulzberger）的笔下，谈到了戴高乐对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看法：“他往往带着他那个阶级——保守派、天主教徒、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圣坛上崇拜波旁王朝妄求者以及莫拉斯^③的传统法国男人——所带有的所有偏见，在人格上鄙视他们。”^④ 他带着屈尊和十足的傲慢把非洲人看得特别令人烦恼。苏兹贝格在日记中写道：“这位将军对黑非洲的个人看法，远非平等主义见解，尽管在广大的法语区各国中只是出现了法属西非殖民地的脆弱稻草人，他还是认识到了非殖民化的当前潮流。他最终建立了一套古怪的体系，从而使那朦胧的独立，既受到法国空降部队的保护，也受到其控制。1956年5月31日，我问他，究竟他是怎样预见法属赤道非洲的未来的？他似乎并不很明白这个问题，但我并未得到机会予以阐明。他又详述起来，语气相当傲慢，带着幼儿园般的方式把阿拉伯人和黑人放到一起谈论，说是真的有差异。他说，那些人是黑人，而

① Dorothy Shipley White, *Black Africa and de Gaulle: From French Empire to Independence*,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1979, p.122. 此处引自 Melvin Goldberg, *Decolonization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with Reference to West Africa*, 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24, No.4, 1986, p.664. 就戴高乐和法国公众对于非洲独立的看法，巴恩斯（Barnes）发表了敏锐的见解。他认为“殖民地的独立并不是很打动戴高乐的观念，也不是法国舆论充分注意的事情。但是，法国在中印半岛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使他清楚地意识到，独立将是不得不在非洲上演的很多演出当中出现的一句话。同时，他不得不料想到，同样的经验已经使许多法国人相信，热带非洲在大法兰西殖民帝国的观念中，是可以凭借而战斗到最后的一道壕沟。这些人决定，必须竭尽全力地扩宽这条壕沟，从而使任何力量不能把他们从其中赶走”。此处引自 Leonard Barnes, *Africa in Eclipse*,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1971, p.162.

② Charles De Gaulle, *Memoirs of Hope: Renewal, and Endeavour*,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71, p.37.

③ 夏尔-马里-福第乌斯·莫拉斯（Charles-Marie-Photius Maurras, 1868—1952），法国作家、诗人、批评家，政治活动“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的领袖和主要思想家，出生于一个保皇派的天主教家庭，有文学才能和政治理论及实践的抱负，推崇过去，反对现代。——译者

④ C.L.Sulzberger, *The Last of the Giants*,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70, p.75.

不是阿拉伯人。他们是黑的。在白人到来之前，他们是野蛮人。他觉得黑非洲大陆并不能独自使自身开化文明。”^① 法国军队在莫边府彻底溃退并遭遇里程碑式的羞辱，在那里，法军损失了 17 个营的部队、2.2 万吨装备、一大批重炮、173 架战斗机和 71 架运输机，实际上损失了一切；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遭受了鬼影一般的大灾难，这一切最终使戴高乐意识到，殖民地获得自由已在帝国产生普遍的压力，这时需要承认和让步，以避免未来再遭受灾难和耻辱。他很懂得这样做。阿尔及利亚是最后一次教训，几乎在法国触发政变。为了使政变的可能性消散，戴高乐号召法国全民族，“法国女人们，法国男人们，帮助我吧”。确实，尽管除了在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之外，由亲法人士统治的法国在非洲帝国的精英们都受到了严重打击，但还有一些人高兴得连《马赛曲》都唱不动，并渴望受到法国的政治支配，戴高乐意识到，做出新殖民主义安排，把权力移交给法国创造而成的精英并对他们做适当安置，比起坐等着出现紧张状态，从而陷入更严重的分裂而使法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受到损害更为明智。“法兰西共同体”就是他做出的回答。因此，尽管在法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反殖民主义从未充分开展起来，比起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更是差很多，但是，若认为 1960 年法国在非洲的帝国取得独立仅仅依据于法国的“善意”和“宽宏大量”，则可能是错误的。^②

葡萄牙的殖民帝国相似地被拆散了，那仅仅是因为安哥拉、莫桑

① C.L.Sulzberger, *The Last of the Giants*,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70, p.74 ~ 75。有趣的是，要注意帝国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构想和设计有关非洲的战略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1961 年 2 月 14 日，苏兹贝格写道：“我询问他，他认为解决阿尔及利亚混乱，会不会改善法国与其前黑非洲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他带着温和的愤慨说：‘为什么就应当那样？除了塞古·杜尔（Sekou Toure）（当时十分偏左的几内亚总统）之外，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好。’” 见同上。

② Charles De Gaulle, *Memoirs of Hope: Renewal, and Endeavour*,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71, p.675。这是盖伊·马丁（Guy Martin）的意见，详见 Guy Martin, *The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ses of France's African Policy*, in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23, No.2, 1985, p.191。

比克、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发生的革命战争，使葡萄牙军队付出了最终难以忍受的代价的缘故。到1974年春天，葡萄牙殖民地所发生的战争已经在该国造成了剧烈的政治紧张，在其军队中尤甚。一些军事部门得出结论说，发生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的战争已经缓慢地强化了十多年，葡萄牙难以取胜。的确，叛乱日甚一日。由一些低级官员领导的、企图于3月16日发动的一场反对法西斯右翼政府的政变已经失败。6个星期后，即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的武装部队行动（Armed Forces Movement）举行了第二次武装政变，推翻了萨拉查-卡埃塔诺（Salazar-Caetano）的独裁统治。^①这就开启了使葡萄牙当局从殖民地血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途径。

总之，在以往的40多年中，经过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对抗，局部政治独立已在非洲实行。没有任何地方是依据道德准则而给予独立的。帝国主义者只有在面临暴力的反殖民主义对抗，或者随后遇到骚乱及暴力反抗的威胁，才肯交出权力。

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定居的殖民制度已经是一段历史的最后一个篇章，这段历史开始于1956年的苏丹、1957年的加纳以及20世纪60年代“独立十年”期间的整个非洲大陆，各国独立的汹涌浪潮，以“变化之风”向南猛烈冲击。^②与非洲其他地方独立运动中所宣告的同样口号，在南部非洲响了起来，并受到赞美和欢呼。这一切都是历史。

① 主要发生在低级职业官员中日益增多的不满，为形成1973年的军官运动（Captains' Movement）开辟了途径。这个职业官员——其中大多数是军官——的特别委员会起初是为了发出他们专业的不平之声而成立的。不久，军官们发现，海军和空军当中的职业军官以及所有军事部门的非职业官员，都与他们一样不满。军官运动发展成为武装部队行动，并于1973年11月形成一个全面的持不同政见组织，该组织的秘密成员遍布于政治领域。其中的官员们除了提出专业地位的问题之外，还对于他们薪酬低微以及长期派驻海外在艰苦条件下工作而不满。见 <http://www.country-data.com/cgi-bin/query/r-10993.html>。

② 人们始终如一地认为，加纳是非洲第一个争取殖民地自由的国家。这种假定基于如下事实，1956年1月获得政治独立的苏丹是一个阿拉伯国家而不是非洲国家，在此意义上，加纳才是。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苏丹事实上是一个非洲国家，阿拉伯人占其国民的一小部分。由于苏丹在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上是由居于少数的阿拉伯人主导，因此人们就对以上事实视而不见了。